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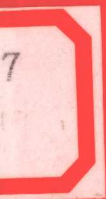
红岩革命故事丛书

红岩革命纪念馆特别奉献

周恩来与 国际友人

● 王泓 宁荣章 范建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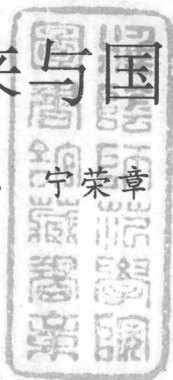
● 重庆大学出版社



795990

周恩来与国际友人

王 泓 宁荣章 范建明



周恩来国际友人

王 宁 荣章 范建明

王 宁 荣章 范建明



淮阴师院图书馆 795990



ISBN 7-283-1024-3/K·43 定价:4.50元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正本:787×1092 1/32 印张:4.025 字数:103千

重庆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050号

000507

周恩来与
国际友人

王 泓 宁 荣 章 范 建 明
责 任 编 辑 孙 英 姿

周恩来与国际友人

王 泓 宁 荣 章 范 建 明

责任编辑 孙英姿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625 字数:103千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624-1054-2/K·42 定价:4.20元

(川)新登字 020号

前 言

周恩来，中共国际统战第一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陪都重庆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光彩溢人。他以巨大的人格魅力、优雅的学识风度、真挚的交友之道、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及通权达变的机敏灵活，几乎折服了所有与之相识的国际友好人士。

国际友人大多数是通过周恩来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从而信任、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出一致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而周恩来则是中共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在陪都时期的国际统战实践，无疑是其外交生涯的预演。

本书尽可能收集了周恩来在陪都时期与国际友人相交的资料，从中撷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个案，编写成故事，希望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国内有关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因为写作体例的原因，不能一一注明出处，谨此致谢。

因为水平有限，错漏难免，不尽人意之处颇多，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真正的独家新闻——周恩来与斯特朗·····	1
真诚的友谊——周恩来与史沫特莱·····	9
大河彼岸的朋友——周恩来与斯诺·····	16
两把军刀后面的友谊——周恩来与卡尔大使·····	24
“上帝的恩赐”——周恩来与费正清·····	30
共产党人与传教士的友谊——周恩来与文幼章·····	41
一次秘密的会见——周恩来与海明威·····	56
共御陪都寒流——周恩来与崔可夫·····	62
特殊的战友——周恩来与王安娜·····	73
师生情谊——周恩来与白修德·····	84
撕开新闻封锁的黑幕——周恩来与外国记者的延安行·····	92
失之交臂的机会——周恩来与谢伟思·····	109
寻找真实的中国——周恩来与外国记者·····	122

真正的独家新闻

——周恩来与斯特朗

1965年11月25日晚。

上海锦江宾馆内。

鲜美的生日蛋糕，跳跃的生日蜡烛。

众多的中外嘉宾。

主持这次生日宴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能获如此殊荣的寿星又是谁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名的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这一天是她的80寿诞。

周恩来举杯祝酒：在安娜·路易斯女士40公岁之际，祝她生日快乐。今后我们会很多的机会来再次祝贺她的生日。

满头白发的斯特朗坐在椅子上。她听到周恩来的祝酒词时，感动极了。啊，“40公岁”，那么美好的祝福。

周恩来送给斯特朗的生日礼物是新版的斯特朗作品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斯特朗刚刚在10天前才读完此书的校样。

那支手棒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斯特朗再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她知道这一定是周恩来善解人意的安排。

斯特朗微笑着，她有些吃力地站起来，决定朗读自己写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新版序言来表示对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的谢意。

毕竟岁月不饶人。斯特朗站的时间稍长，便感到不适。有位工作人员察觉到了，想搬把椅子给她。同时注意到场内情况的周恩来却严肃而又微妙地挥手制止了工作人员的举动。周恩来深深了解斯特朗此时的心境。

斯特朗刚讲完话，周恩来立即走过去，亲自扶她坐下。

这是周恩来和斯特朗长达 30 多年友谊中动人的一幕。

周恩来与斯特朗的友谊始于武汉。

那是 1938 年初。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刚迁武汉。到处是一片混乱忙碌的迹象。

斯特朗夹杂在嘈杂拥挤的人流中也来到了武汉。她到达武汉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是武汉党政军界极为活跃的人物。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采访周恩来无疑具有巨大的新闻时效性。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捷和作家对历史现状的洞察使斯特朗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在此之前，斯特朗与周恩来曾有过短暂的相遇，但未作过正式交谈。但斯特朗和周恩来对对方无疑都有一些了解。斯特朗是从她的朋友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里了解到周恩来的传奇生涯及巨大的人格魅力的；而博闻强识、交友极多的周恩来也有他的信息网络：美国记者兼作家安娜·路易斯在 1921 年就曾到社会主义苏联采访，并且同后来的中国大革命政治总顾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1925 年，斯特朗首次访华，两年后，她再次来华。根据这两次访华见闻，她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这一次是她第三次访华了。

因此，周恩来与斯特朗见面时，双方都无拘无束，仿佛早

已相识的朋友。斯特朗请周恩来谈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些在当时是极为敏感而且十分复杂微妙的问题。周恩来当然对此作了圆满的答复。言语准确，论述精辟，使斯特朗茅塞顿开。

斯特朗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中共的政策：“共产党将坚定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但我们也要求相当的独立性。”

对于斯特朗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周恩来都反映敏捷地一一给予了解答。当斯特朗问到关于中国妇女的问题时，周恩来建议斯特朗去会见他的夫人邓颖超。

在这次会谈中，斯特朗发现自己为“一位宁静的、漂亮的男子”深深吸引了。周恩来是一位能够信任的朋友。

这一年斯特朗已经52岁了。她不懈地追求她的目标：从革命发源地搜集革命信息，再把这种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次中国之行，使她写成了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

1940年12月底，斯特朗极偶然地实现了她的第四次访华。当时正试图从苏联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获悉从阿拉木图到重庆有飞机，便改变行程来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准备转途美国。在这里，斯特朗再次会晤老朋友周恩来，并得到了她新闻生涯中真正的独家新闻。这次交往无疑是斯特朗与周恩来交谊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1940年12月，斯特朗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陪都重庆。一下飞机，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袭来，她隐隐感到有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中。

斯特朗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的官邸里遇见了埃文斯·卡尔逊上校和路易·艾黎。他们两人都向她详细叙述了国共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久，伊斯雷尔·爱

泼斯坦又向斯特朗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新四军的情况。爱泼斯坦的材料证实蒋介石似乎要向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组建的极有声望的抗日军队下手。

阴谋正在策划。斯特朗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是她不知道她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做些什么。

这时，周恩来派人邀请斯特朗到周公馆，准备和老朋友作深夜长谈，以便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这是连续几个晚上的彻夜长谈。

为客人沏上茶后，周恩来总是开门见山向斯特朗阐述国共关系的进程。他的谈话重点是目前的国共关系。

周恩来告诉斯特朗：“近两年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的将领不断加剧对我们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层层封锁；在其它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也不断侵夺我们的地盘。今年夏季前后，在河北、山东、赣北、皖东、皖南等地，国共军队都发生了冲突事件。”

稍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说：“我曾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

斯特朗抬起头来，暂时停止了记录，她说：“我对国共之间的冲突有所耳闻。”

周恩来在会谈中举出了许许多多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例。比如，派到延安去的学生，走到西安时，却遭到国民党的无理扣留；许多国民党将领与日本人勾结反共等等。周恩来把说明真实情况的材料交给了斯特朗。

周恩来在谈到目前的时局时，他的双目满含愤怒：

“我的政治直觉告诉我，国共之间的公开冲突不久就要到来。蒋介石已经下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撤到黄河以北，与八路军汇合。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么所

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将集中在北方而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从而为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创造条件。下一步就是蒋介石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结盟。”

周恩来总结说：“蒋介石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在最后一次交谈时，斯特朗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相信周恩来找她长谈，必有所托，她愿意为周恩来做任何事。

果然，周恩来交给斯特朗一份长达 26 页的文件及其他资料后，极郑重地嘱咐道：“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

周恩来放慢了说话速度，向斯特朗解释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斯特朗此刻除了感动，已无话可说。周恩来把自己视为“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这是非常人所能得到的殊荣。斯特朗只极其郑重地点头，表示一切都按周恩来说的办，定不负所托。

在安娜·路易斯离开重庆前，蒋介石接见了她。斯特朗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些周恩来表示过关心的问题。可以想象，蒋介石愤然否认有同日本讲和或把中国分裂成两部分的任何企图。斯特朗当然不相信蒋介石的声明。但是，斯特朗通过海关时还是捏了一把汗。她担心那本记满了此次采访资料的笔记本被搜查出来。国民党严厉的战时新闻检查是众所周知的。令人欣慰的是，她顺利通过了海关，她的笔记本没有被检查。

在香港，按照周恩来给她的地址，斯特朗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1925年斯特朗在广州时便与廖承志相识。廖承志当然知道斯特朗带着那些资料。他对斯特朗说：“是否公布以及何时公布那些资料，我会通知你的。”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安徽茂林地区残杀北上抗日途中的新四军将士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闻讯后悲愤异常，挥毫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诗篇，向国内外控诉国民党的罪恶。

乘船返美途中，斯特朗从轮船上的广播中听到了皖南冲突的零星消息。当她到达旧金山时，急忙找来报纸，发现报纸上大多采用国民党官方的说法，说此次事件是新四军叛乱，被国军剿灭；斯特朗的老朋友斯诺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则披露了事实的真相：数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突袭了北上抗日的新四军。

斯特朗知道该是向舆论界披露真相的时候了。2月初，安娜·路易斯收到一封盖着马尼拉邮戳未署名的信：“公布你知道的情况。”信封里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及一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声明，声明详细列述了重庆亲日派密谋把国民党拉入法西斯联盟的15个步骤。

这一定是周恩来的指示。收到信后，斯特朗立即来到北美新闻通讯社。北美新闻通讯社和斯特朗签了两篇文章的合同，同意在美国极其重要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她的文章。做完这些之后，斯特朗立即从纽约飞往华盛顿，与爱丽诺·罗斯福共进午餐。爱丽诺答应为斯特朗安排一次与小亨利·摩根索的会见。摩根索财政部长负责对中国的财政援助。斯特朗还会见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事务

的官员约翰·戴维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并把资料给了他们一人一份。显然，斯特朗要尽可能广泛地把事情的真相披露出来。

然而，当斯特朗回到纽约后，北美新闻通讯社却通知她：《纽约时报》不准备采用她的文章，他们怀疑作者的政治立场，而宁愿支持重庆编造的谎言：整个事件仅仅是对“叛乱”的镇压。《纽约时报》接受了蒋介石的观点。

怎么办？斯特朗不想辜负周恩来的重托。她毫不气馁地又来到纽约《先驱论坛报》，找到老朋友乔·巴恩斯。

斯特朗把周恩来提供给她们的原始资料都给了巴恩斯。斯特朗说：“我不认为这些资料是我个人的财产。”

巴恩斯高兴极了。他用斯特朗给他的材料写了一篇文章。他获得了一条成功的独家新闻。

蒋介石政权在美国舆论界受到责难。

斯特朗评论说，巴恩斯的那篇文章是她读到的唯一真正的独家新闻。

尽管文章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斯特朗仍然极感欣慰：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不负周恩来所托，这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吗？

1946年到1947年，斯特朗再访中国。她在延安的窑洞里又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在此期间，斯特朗把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报道给全世界。

在蒋介石攻占延安前夕，斯特朗离开了周恩来等老朋友。

临别前，周恩来告诉她：几年后当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后，欢迎再次来华。

周恩来的预言很快成为现实。

1958年底，已届73岁的斯特朗最后一次回到中国。她在

这片土地上度过了难忘的 80 寿诞，直到 1970 年病逝北京。周
恩来在出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追悼会时，当众
流出了眼泪。

他怀念这位“中国人民之友”。
，
，
，
。

。来
。

。

。

。

。

。

。

。

。

。

真诚的友谊

——周恩来与史沫特莱

1951年初夏的一天，新中国首都北京，微风送来阵阵凉爽，万物一派生机。它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一年之后，重又回到她心爱的中华土地。

史沫特莱，生在美国，属于世界；来自底层，植根大地。她是“大地的女儿”。

史沫特莱，是优秀作家，杰出的记者；是无畏的战士，旧世界的叛逆。她的著作，她的报道，无一不是她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作英勇不屈的战斗的写照。

史沫特莱，对中国一往情深。从1928年底经过苏联，进入“中世纪”的中国东北，到1940年秋前往香港治病，后在1941年日军进攻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返回美国，整整12年岁月，她与中国人民紧密地生活、战斗在一起，她目击了此期中国历史进程，并大力宣传报道；她亲睹了此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往往还积极参与；她已变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正进行着的伟大的斗争的一部分，以至她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12年中国经历，构成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史沫特莱，赢得世人广泛称颂。茅盾说：“她是我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

周恩来，她是伟大的美国人。她以中国革命为题材，写下作品数百万言，成绩卓然无比。

周恩来首次见到史沫特莱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

九朝故都西安，虽然隆冬寒风凛冽，但近日来却是一派欢腾景象。前来督促“剿匪”的蒋介石，反遭东北、西北军将士的“兵谏”软禁。爱国的人们雀跃欢呼，庆贺逮捕了发动反共内战、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的祸首蒋介石。

“西安事变”第二天，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只见周恩来风度翩翩，面带微笑，双目炯炯，不失机警沉着。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如何解决，将直接影响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周恩来肩上的担子太沉重。

当时史沫特莱正在西安，听到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后极为兴奋。她迅速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等东北、西北军高级将领，又从中共党员刘鼎那里得到大量来自共产党中央的消息，因此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关于这次事变的系统全面的报道，资料翔实准确，令读者信服。

周恩来到西安后，史沫特莱要刘鼎引荐她去见这位慕名已久的共产党高级领袖。刘鼎答应了她。

于是，她在刘鼎陪同下来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闻声迎到门口，用英语笑着说：“你好！史沫特莱女士。”在此之前，周恩来对史沫特莱略有所知：她是著名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的作者，她以报告文学《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和《中国红军在前进》首次向世界从侧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情况，斯诺也多次谈起过史沫特莱，所以一见面，周恩来对史沫特莱就显得亲切友好。

一向敢说敢为，有自己主张见地的史沫特莱，自然不信国民党关于周恩来这位“共匪”首领诸如“青面獠牙”、“杀人魔王”等谣传，一见周恩来，她便被他那潇洒大方的领袖风采所吸引。在客厅坐下后，史沫特莱开门见山地问道：“周先生这次到西安，是不是要把蒋介石押到苏区交给人民公审；然后处

死？”

周恩来哈哈笑道：“我们不准这样做。”

史沫特莱感到不解，问道：“他杀害了你们那么多人，是你们的死敌，难道要轻易放过他吗？”

周恩来浓眉一挑，坚定地说：“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两将军提出的八项抗日爱国主张，就放他回南京去。”

史沫特莱仍然困惑：“既然要放蒋介石，为什么又要逮捕他呢？”

周恩来说，逮捕蒋介石，并不是要杀掉他，而是要逼他改变政策，同意抗日的正义要求。

史沫特莱又提出她的担心：要是蒋介石不答应张、杨的主张又怎么办呢？

周恩来含笑说道：“蒋介石一定会答应的。”接着他详加分析：国民党内存在亲日与亲英美派的斗争，对于蒋介石的被逮捕，亲日派何应钦最高兴，唯恐我们不杀蒋介石；对于这点，蒋介石内心明白，他怕死，就不得不选择抗日的条件。

史沫特莱开始有些明白了。

周恩来又进一步说，虽然对于放蒋，很多人从个人情感讲，不很愿意，但中国目前局势复杂，考虑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如把蒋杀了，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群龙无首，必然互相残杀，兵祸相连，这会给日本侵略提供一个极好机会。相反，如放蒋回去，则可稳定形势，还可逼蒋改变政策，把他的军事力量用到抗日前线上来，这对中华民族利益大大有利。

周恩来一席话，使史沫特莱茅塞顿开，听得她频频点头。她想，自己开始的想法多么幼稚呀。同时，她又不得不深深佩服共产党的英明远见。

看来，共产党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周恩来对史沫特莱所作的用谈判方式解决事变的分析，后来毛泽东曾用“赶毛驴上山”的比喻为史沫特莱作过生动解释。毛泽东说，毛驴不肯上山，陕北农民就用三种办法对付它即拉它、推它、打它，总要把它赶上山去；蒋介石不肯抗日，我们也用拉、推、打的办法，让他走上抗日战场。史沫特莱听了大笑不止。

“西安事变”后不久，史沫特莱踏上了陕北苏区的土地，她要像斯诺一样，去亲自访问红色中国。

她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斯诺是第一个访问红区的外国记者，你也是第一个——第一个访问红区的外国女记者，你的报道将使你名扬世界。

她见到了憨厚朴实的朱德总司令——一位杰出的农民将军。她从此下决心为他立传，终于穷多年心血，完成了不朽杰作《伟大的道德——朱德的生平与时代》。

她再见周恩来时，他们的友情已经更加增进。

“史沫特莱女士，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周恩来笑着问候。

“我也想不到苏区比传闻中还好得多，特别是这里的人，似乎是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英。”史沫特莱显得兴高采烈。

史沫特莱陶醉于这块新天地，终日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不断采访报道，忙得不亦乐乎。她还暗下了一个决心，在延安推广交谊舞！让有些单调的红军将士的生活变得生动活泼起来。首先从毛泽东、朱德“开刀”，施用“诡计”终于把他们“拉下水”。

于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徐海东、林彪、左权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来了，甚至彭德怀也笑咪咪地进入舞场——只是他不是来跳